

國父的救國大政略

陳之夫

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自立志決定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以後，無時無刻不以救國救民爲念。他深知中國革命的成功比別國爲難，自從鴉片戰爭後，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都侵略中國，都與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各國在中國都有最優惠的條款，都有租借地、租界和勢力範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同其他的殖民地完全不同。譬如印度，他唯一的對象是英國，只要對付英國即可。如安南，只要對付法國就可以了。韓國只要對付日本就可以了。中國是受全世界所有的帝國主義的聯合壓迫，比之其他殖民地還不如，國父爲當時的中國取了一個特別名詞叫做「次殖民地」，要使中國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就要分別對付得了各國帝國主義者，才能革命成功，否則他們就要把中國瓜分。再就國內而言，一般國民接受滿清政府的統治已兩百數十年，也比其他被統治者受苦長久得多，民族精神消失殆盡，士大夫中多數是效忠清廷。在這麼艱難險困的環境下，中國革命的成功要比他國不知艱難多少倍，可是國父率先倡導革命，沒有什麼憑藉，完全是由思想來領導全民，完全靠他那偉大的思想做指針，用他那種大無畏的精神，發揮至誠的愛國心，以喚起全民的愛國共鳴，在九次革命運動失敗之後，仍然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慷慨犧牲，若不是受了國父救國誠心的號召，怎能如此？這一個救國思想產生了信仰，信仰復產生了力量，這力量才把中國從腐敗的滿清統治中救出來，亦從各個帝國主義的重重壓迫下開始站起來。這其間不知經過了多少次艱辛的鬥爭，那些經過的重要史實，大家可從各種現代史中得知概要，可是國父爲了救國救民而委曲求全的苦心，則多爲世人所未能了解，這就是我在本文所要說明的「政略」。

所謂「政略」是政治鬥爭所用的策略，蔣總統對此有詳細的說明，

他說：「作戰的勝負，在戰場上看來，雖是決于軍隊的鬥爭，但是鬥爭之上還有戰術；戰術之上，還有戰略；戰略之上，還有政略。我們既然知道物質上比不上他人，就要在精神方面拚命想法來戰勝敵人，這是一定可能的。如果在鬥爭上不能勝過敵人，就要在戰術上來取勝；如果戰術上不能勝過敵人，就要在戰略上來取勝；如果戰略上還不能勝過敵人，我們一定要在政略上取勝。但是戰術、戰略、政略的運用，全靠做將領的人、尤其是統帥能夠神明變化。」（民族戰爭取勝的要訣）這可見政略的重要。國父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曾說黨的鬥爭要同軍隊作戰一樣，所以他爲達成救國救民的大志，必須隨時注重政略的運用。他曾說：「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政綱是隨時可以修正的。」政略的運用就如同政綱一樣，要能靈活運用，才能實現這永遠不變的三民主義。如果一成不變，則如同膠柱鼓瑟，不但于事無補，有時反足以敗事。不過運用政略，不能違背主義，所以既不是投機取巧，也不是不擇手段，國父的運用政略正是古人所謂「人心惟危，道心（仁）惟微，惟精惟一（誠）、允執厥中（中）。」就是以至誠之心懷，爲行仁之努力，求恰到好處。

我現在爲大家擇要敘述 國父的救國大政略。

一、讀總統職位給袁世凱，以換取國家民族的新生命

武昌起義之役是中國近代史的大事，可是革命的力量很是微弱；若是沒有黃克強先生在武漢起義，隨而如果没有我先叔陳公英士的光復上海，則長江各省就不會響應，那武漢就可能支持不住，由於兩地互相呼應，聲勢浩大，不數月而十五省光復，遂使清廷喪胆。所以國父說：「武昌

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時響應之最大力而影響于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者尤多也。」（孫文學說第八章）其時真正的軍事力量，是在袁世凱的手裏，清室已無法支持此危局，一切聽之袁世凱。革命軍方面，指揮既不統一，意見又復紛歧，如滬軍都督先叔陳英士首先致電各省，籌組北伐聯軍，分三路大舉進攻；閩督則主張區分節次計畫，監督主張分三路各省自認一路；而武漢方面，因漢陽失守，已與清軍有停戰的商議，黎元洪又分電各省請援兵集中鄂省，再定進攻計畫；各省都督均發電表示意見，方針各異。如此情勢，正是上文 蔣總統所說的在門爭上、戰術上、戰略上都不能勝過敵人，祇有運用政略才能取勝。國父對於這些情勢，瞭如指掌，他的革命第一個目的，是建立共和政體，知道袁世凱的野心很大，若不把總統職位讓給他，他可能會反過來幫助清廷，把革命軍打垮，所以 國父當時毅然決定運用大政略，讓總統職位給袁世凱，以交換一個國家民族的新生命——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國父于民元前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當選臨時大總統，立即去電袁世凱：「文前日抵滬，諸同志皆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問其理由，蓋以東南各省久缺統一之機關，行動非常困難，故以組織臨時政府為生存之必要條件。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祇能暫時担任。公方以旋乾轉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于將來。」正月一日就職後，即申令定國號為中華民國，再電袁世凱，略謂：「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故于讓和之舉，並不反對。……倘由君之力，不勞戰事，達國民之志願，保民族之調和，清室亦得安樂，一舉數善，推功讓能，自是公論。」可是袁及北方將領仍多懷疑，直至二月十日，清帝始宣布退位， 國父即實踐諾言，向參議院辭職，推薦袁世凱繼任。但以就職地點、組織統一政府及國都問題，眾說紛紜，延遲未決，致 國父于二月十日辭職，至四月一日始解職，其間頗呈紛亂之象。終以 國父容忍為國，委曲求全，始得漸次解決。這種公而忘私的民族正氣的表現是多麼偉大！那時如果不運用這個政略，袁世凱可能效忠滿

清再打革命軍，那中國的革命恐怕要再延遲許多年。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國父的犧牲總統名位是有遠見的政略。當時也有人不贊成他讓位，可是他下決心，只要袁能維護民主政權，驅逐滿清，他寧願犧牲小我，這一來他暴露做皇帝的野心，全國民眾，已有了民主的觀念，見袁貪言自私，自然羣起而攻之，時代思潮所趨，袁是已經無法違抗的了。國父的能屈能伸，所見遠大，這是值得大家最欽佩的。後來 國父著「中國革命史」，其中評論武昌起義一役所得之結果，認為：「一為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耻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復軋轢凌制之象。二為剷除四千餘年君主專制之迹，使民主政治得以開始。」實在這兩個結果，都是 國父運用大政略所得的。

二、歡迎各國投資開發中國，以消弭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

國父創立興中會的時候，正值日本侵略高麗，打敗清軍，以至馬關條約的簽訂，他對當時的局勢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說：「中國因為日清一戰，才引出列強要瓜分的論調。」（民族主義第二講）因為馬關條約，許高麗獨立，割台灣遼東，于是引起三國干涉遼東一件事，干涉遼東表面上好像是幫助中國，其實是俄、德、法三國不要日本所得的權利太多，因而強使日本退還遼東，增加賠款。接着就有人倡議要瓜分中國，于是美國才建議門戶開放主義，列強頗多贊同；接着就有八國聯軍之役。國父對於列強要瓜分中國的念頭，最為關心，所以他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他認為當時軍閥的惡勢力所以存在，實由于帝國主義的羽翼、扶植，民國初年的連年戰禍，直接受自軍閥，間接受自帝國主義者。所以他幾次要北伐，明白的宣言，「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

那時列強的心理，以為中國永遠不能振作，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所以

把中國沿海的地方像大連、威海衛、九龍等處來佔領，做一個根據地，以便瓜分中國。平心而論，那時的中國確實不能振作，軍閥爭權奪利，南北又復對峙，于是列強有秘密商量瓜分中國的陰謀，擬在中國各自劃定勢力範圍。國父知道列強都貪圖中國的土地財寶，于是就首先宣布歡迎各國來中國投資，共同開發；同時著作「實業計畫」一書，分寄各國政府與歐洲和會。這計畫主張「是借用外資，從事生產的事業，像開闢市場、興辦工廠、建築鐵路、修治運河、開發礦產，」那時列強也知道用政治力量來瓜分中國是很不容易的，也要改用經濟力量來瓜分，所以對於實業計畫都表示贊同，巴黎就有新銀行團的成立，思欲協助中國發展天然物產，聞此舉的發起人，出自美國政府。「實業計畫」原稿是英文，俾外人容易看懂。現在的中文實是朱執信、廖仲愷、林雲陔、馬君武諸先生所譯，在序文中提到國際性發展的工業化，如何對中國及列強都有利益，無異揭開國際瓜分中國的陰謀。歡迎各國投資協力推行工業，是依照大同篇的大同精神：「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於己。」鼓勵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來實踐服務的人生觀及天下為公的真精神，歡迎大家來開發，就是要避免少數帝國主義者的秘密分贓，以公開對付秘密，以偉大對付渺小，以大公無私對付自私自利。國父運用這一政略，就消弭了帝國主義的陰謀，這一點，也可見到他的魄力雄偉，眼光遠大，于救國策略而言是很重要的，對國家的貢獻何等偉大。所以蔣總統認為此書是國家經濟的大政策，「民生與國防的合一，在此一根本意義上最為顯明，也最為扼要。從此觀點來讀之，沒有一條一目不含著博大深遠的意義在裡面。」「單從實業計畫的規模來說，即可以使我们起衰立懦了。」

三、容納共黨共同革命，以免共黨與北方軍閥聯合之患

對於國父採取容共的政策，許多人都不大諒解。當時第三國際（實際就是蘇俄）派了越飛將軍到中國來，他先到北方與軍閥接觸，然後國父約他到南方來談判。國父知道，若是不與他合作，他可能會使共產黨與北方軍閥聯合，因為當時軍閥的存在都由於帝國主義的扶植，其中如馮

玉祥之流，便是很可能的。國父對共產主義早有深刻的認識，所以他在三民主義中，對於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和階級鬥爭的邪惡，不但一一指出其謬誤，而且痛加駁斥。他認為「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于有衝突。」所以批評馬克斯倒果為因，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只可以說他為社會病理家，不能說社會生理家。國父對民生主義曾作進一步的解釋：「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社會問題能夠解決，人類才可享很大的幸福。所以他曾剴切告訴國人：「不能用馬克斯方法到中國來實行。」

那麼為什麼要容共呢？我以為至少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上文所說的恐怕共產黨與軍閥聯合，另一原因是深知當時的中國社會對於五四運動後經由俄國輸入的共產主義，沒有抵擋的能力，在此情況下，便要考慮到如何把那些主張用馬克斯的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的猛進青年吸收到國民黨內，引導他們朝向三民主義的目標前進。採用容共政策是希望把打進黨內的中國共產黨員消化掉，以期弭患于無形。所以國父與越飛簽訂了幾項原則：第一點，中國是適合三民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而且中國需要統一；第二點，要所有的共產黨員個別參加國民黨為黨員，而不是以團體參加。同時，他要越飛與他發表一個共同宣言，有了這個宣言，第一、中國的主義是三民主義；第二，中國的革命領袖是孫中山先生；第三、中國的革命組織是中國國民黨，惟可容納共產黨員個別參加為其黨員，以便共同奮鬥而已。蓋革命所需要的有三項要件：主義、領袖、與組織，都在這宣言中確定了，這樣，國民革命的力量才能集中，工作才能繼續。當時陳獨秀、李大釗等都表示接受；可是若干老國民黨黨員認為本黨容共政策是件十分危險的事，加以反對，因為他們知道共產黨是狡猾多端，必須時時提防。國父為了顧全黨的力量，加強革命工作的推行，決定冒這個險，他認為大的體制先確立，小的問題再慢慢解決，這一點，也是很偉大的，非有革命的勇敢，決不敢冒此大險。所以他說：「共黨能守吾黨範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

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後，共黨個別加入，我們採取了蘇聯的黨政體系，也學了許多推行革命的花樣。不過容共政策却擊斃了共黨，加入本黨的共產黨員仍舊受外力指揮暗中結合，成為小組織，使用分化、利用手段，陰謀破壞影響到國民黨的領導階層。先利用有野心的汪精衛，使與胡漢民意見不合；復利用廖仲愷被刺事件，以逼走胡漢民；再逼使堅決反共的老同志離開廣州，激成後來的西山會議。蘇聯顧問鮑羅廷則以共黨為核心，國民黨為外圍，逐漸發展共黨勢力。遂有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事變，苟非蔣公處理敏捷，則廣東革命基地，就會落入共黨手中，好在自此以後，家兄果夫在中央組織部也開班訓練了一批幹部和他們鬥爭，使北伐軍事得以順利進行。十六年三月，共產國際對北伐進展之速，感到意外，認為由鮑羅廷造成的武漢左派組織不足與南京中央抗衡，不能達成破壞、阻碍北伐目的，於是促汪精衛由法回國，汪到滬，即與陳獨秀共同發表宣言，其時本黨不再容忍共黨的滲透、劫持，遂毅然決定清黨。清黨工作發動之時，本黨幹部全體動員，把不忠于本黨的共黨份子清了出去，於是共黨走上流寇之路。後來經過國軍的四次圍剿，匪軍潰敗，由江西流竄到陝北延安，苟延殘喘，要不是抗日軍興，我想那時的剿匪一定成功，那麼今天的世界局勢必不致如此混亂了。

而且當年如果不容納共黨，也沒有人會知道共產黨是什麼樣壞，他們是如何不守信用，為何參加本黨來作滲透顛覆的工作。其實這些情形，亦已在國父預料之中。國父權衡利害，認為若是不這麼做可能更危險，他們儘可利用軍閥一時，以長大自己，以欺騙青年，反抗革命力量，這樣豈不樹敵更多。容共之後，自可靠着本黨的青年幹部去和他們鬥爭，尚有成功的希望。這一點，我認為國父的救國政略之決定上，是很有遠見的。在那時，懂得國父政略的人、像蔣總統者不多。國父的處境很難，他要把共產黨吞下去消化他們，若是消化不了，他也有處理辦法，他並不怪許多老黨員的反對，只怕本黨沒有消化共黨的能力。可惜他逝世太早了，這個責任就落在蔣公的肩上，終於有清黨剿匪之役，艱苦備嘗。在對日抗戰的時候，蔣總統也運用了國父救國的大政略，與共黨聯合作戰，這不是明知故犯或重蹈覆轍，亦因為若不這麼做可能更危險。蔣

總統對於這一點，深謀熟慮更為周詳，知道共黨一定會利用抗戰，以長大自己，可是中央有力量予以防範。在抗戰結束之後，要不是蘇俄的大力支持共黨，和美國錯誤政策的間接協助，我想我們一定不會從大陸上敗退下來。我所以說到這點，亦是要證明國父的容共政策也是救國的偉大政略，在當時是非常正確的。

四、北上磋商國民會議，使革命力量到達北方，為後來的統一鋪路

國父認為要解決中國內亂問題，必須統一中國。對於統一中國的途徑，最初是主張非出兵北伐不為功，他說：「我們革命不成功，中國便要亡國，……所以我們的革命不得不成功，因為這個原故，我們此刻在廣東一定要北伐。中國的存亡，就在我們能不能北伐。」（十三年三月講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又說：「際此時能進則存，不進則亡，必然之理也。」（十三年十月北伐致蔣校長函）可是其時革命軍的力量有限，攻克江西的贛州和吉安，便不能前進，於是乃決定改用政治方式。蔣總統會說：「民國十三年總理再度率師北伐，已經攻克江西的贛州和吉安，然終因軍事力量單薄，不能前進，仍舊退回廣州。乃決定改用政治方式到當時的首都北平去號召革命，於是繞道上海北上。」（本黨革命之經過與成敗的因果關係）

這一次改變，也可以說是國父的救國大政略，他知道專靠武力統一已無法取勝，於是乃轉而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當他到達上海時，有記者問他，要統一中國是要用甚麼方法？他回答說：「第一步的方法是開國民會議，由全國國民自動的去解決國事。」「全國有大實力的人，都是贊成聯絡起來，共同推倒軍閥。……以後解決國事，不必要再用武力，所以我放棄西南，隻身往北方去，提倡和平統一。和平統一的辦法，是開一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的目的，要解決兩個大問題：（一）是解決國內民生問題，（二）是打破列強的侵略，就是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國父始終認為當時軍閥勢力所以存在，完全是由帝國主義者作保鏢，所以念念不忘要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

國父這次躬往北平，磋商國民會議，冀以政治方式達成統一，可是一

到北平，他就病倒了，所以和平統一，也並沒有成功，只好把「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列入遺囑中，由蔣總統為之實現。民國十七年三月，蔣總司令統兵繼續北伐，日本帝國主義者看見中國的統一就在眼前，乃直接進兵濟南，以阻撓國民革命軍北進，要使我們的北伐計畫根本消除，致造成五三慘案。革命軍洞察日本陰謀，毅然不變初衷，仍依照預定計畫百折不回，向北挺進，竟於慘案後一個多月克復了北平，達成了北伐的目的，完成了國父的遺志。這次北伐的成功，固由於國民革命軍忠勇將士的戮力，而北方革命青年及民衆的奮鬥，實為最大原因。所以我說國父的北上在表面上雖然沒有什麼成就，而影響所及，使革命力量到達北方，實有莫大的收穫，這就是國父利用救國政略又有一次的成效。

五、結論

由上所述，可知國父的偉大之處，是一心為國為民，故凡有利於救國救民之事，則不惜委屈求全，對於一己的榮辱利害在所不計。孔子說：「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國父所運用的大政略，正是他的大智大仁大勇的表現。因為他深知中國革命的成功比他國為難，而革命實力又如如此薄弱，只能以智取勝，以思想取勝，所以每次遭遇到艱難險阻的時候，不是戰術戰略所能解決，便只有運用政略，以求達致其成功。國父是革命家，最重要的要實現他的理想，不是講空話，要能以身作則；所以他讓去總統職位，他隻身北上謀和，他容納與自己理想相反的共產黨，其目的無非是救國，要實現他的理想。呂氏春秋謂「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又謂「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藥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國父的運用政略，正因為他是良醫，知道對症下藥，實可與言化矣。這是我研究國父思想所得的一部份淺見，因就國父一生為救國所用的政略，或為世人所未盡了解者，特舉數例，以供研究國父思想者作參考。

楊亮功等四十五位集體創作！

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

初版瞬告售罄 再版繼續供應

當代傳奇人物之真人實事！

啓示人生歷程之追求方向！

本書初版發行不及三月，瞬告售罄，足見雲五先生之學識、品德、成就廣為讀者所敬仰。讀畢全書可體會雲五先生成功之關鍵，並啓示對人生追求之方向。本書初版問世後，續奉大作三篇，茲補刊發行，合共四十九篇，皆從各種不同角度，據實撰述一位苦學成功偉人的寫照，亦為一部創業奮鬥的寶鑑。

精裝本一八〇元 平裝本一四〇元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出售——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六五號